

毕业一甲子

○杨训仁（1952物理）

去年刚度过母校百年校庆，今年又迎来我班毕业60周年。对于我个人来说，后者的意义似乎更大于前者。由于历史原因，使我们班至少具有两大特点：是清华解放前最后一批入学的学生，同时又是清华“老物理系”最后一班毕业的学生。

那时的毕业分配完全不看学习成绩，更不存在个人志愿，“志愿”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可“组织”只是个抽象概念，还是得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在几十年以后一次返校同学聚会上，一位知情者不经意的透露，我才得知那位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具体人是谁。当年我被分配到天津一所水产专科学校任物理助教，那所学校历史悠久，却一直未开设物理课程，我去了完全是“白手起家”。仅有的一位副教授只管讲课，其余所有的事，从创建实验室、置办仪器、编印实验讲义，直到辅导答疑、上习题课、批改作业，以及不久后又给“中专班”讲课等等，全都压在我这小助教身上。毫不夸张地说，我一个人至少干了两三个人的活，但凭着当时年轻人的一股热情，更凭着母校所赋予的坚实业务能力，我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一年后由于院系调整，该校并入上海



物理系1952级（4年制）毕业60周年聚会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为杨训仁学长

水产学院，我则被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又一年，院方为了照顾一位兼职教授，硬将我调到河北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以“交换”其副教授夫人。短短三年换了三个单位，我完完全全服从安排。1955年，中国科学院公开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师院以工作离不开为由没有同意我报考，第二年我才得以报考。

我第一志愿选的是应用物理研究所马大猷学部委员为导师的“理论声学”专业。说实话，之所以选这一“冷门”主要出于如下两点考虑：一是旧制大学中未曾系统地设置“四大力学”，我在清华只正规学习过理论力学和电磁学（并非电动力学）；量子力学仅在大四下学期由主要在

近代物理所任职的彭桓武老师于每周四下午来“填鸭式”地连讲三四小时，好在我当时是课代表，学习上未敢有所懈怠。二是我毕业后一直忙于普通物理教学，难以同刚毕业的和毕业后专门从事科研的精英们竞争“热门”。招生简章中列出该专业考试科目之一“理论物理”的参考书目只包括周培源《理论力学》、王竹溪《统计力学》和塔姆《电学原理》，而没有量子力学。考前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几乎全部用来啃《统计力学》，可到了考场一看试卷，发现“四大力学”每门一题，我以为发错试卷，便立即向监考人员提出疑议。他走出考场去问，足足20分钟后才回来，告知说“应用物理研究所所有各专业的试卷都是统一的”，白白耽误了极其宝贵的20分钟！我也没功夫抱怨，抓紧时间答题吧。好在理论力学驾轻就熟，量子力学题“碰巧”也没难倒我，但统计力学题答得很不理想，最糟的是电动力学题，完全摸不着头脑。结果我的“理论物理”只是勉强及格，但由于其余两门“普通物理”和“英文”成绩非常突出，最后还是“高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科考试成绩与所花准备时间恰成反比。后来还得知，不但考题而且录取标准也是全所统一的，根本不存在“冷门”一说。虽难免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但我对当初的选择并不后悔。

1957年5月入学时，声学方面已归属于新成立的电子所筹备委员会，大楼尚未盖成，暂时租用西苑大旅社一幢楼办公。不久就开始“反右”、“大跃进”，研究生学习被迫中断，有的所，如高能物理所，干脆取消了研究生。我们同一般科研

人员一样参加科研工作，只是工资仍打八折。这样一直到1962年才又奉命恢复学习，通过两门外语和两门专业基础课考试后，便着手准备题为《运动分层介质中脉冲点声源的衍射场》的毕业论文。本来我的专业和本选题都是纯理论性的，但有位“关键人物”提出一定要有实验，只得又花了大半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足够实验数据，最后于1964年9月通过答辩，以全优成绩毕业。整个研究生学习前后历时7年零4个月，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当初承诺的“副博士”学位也不再提起，尽管后来有一帮权威人士宣称“实际上相当于博士水平”，却无任何书面凭证。

关于上文提到考两门外语，可以再啰嗦几句。我在高三时就学过修辞学（rhetoric），清华大一时，英文课共分11个组，除01组为外文系学生外，其余各组均为混合编组，我被编在02组，只有这两组是由美国教师用“直接法”授课。三十几年后我多次出国讲学，基本上还是靠的这点“老底”；改革开放之初，物理所还让我为全所青年科研人员讲授科技英文的阅读、翻译技巧。大二时，理学院的学生必须选修第二外语，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都选俄语，唯独我选了德语，我认为俄语以后有的是机会学，而德语对学习物理又显得特别重要。到后来研究生要考第二外语时，因长期不用，德语几乎已全还给老师了，情急之下便独自一人全身心突击学习俄语一个月。为了巩固成果，我立即着手翻译苏联科学院布列霍夫斯基院士的传世巨著《分层介质中的波》，并于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值年园地

我毕业后留所（已由电子所分出，另成立了声学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即职称仍只相当于入学前的讲师，只是工资提了一级。论文答辩后不足一周，即被派往福建前线去完成一项国防科研任务，后来此项工作以及另一项与其相关的工作均获国家级奖励，尽管我绝对是“主力”，但由于“政治”原因（详见下文）而被排名在第五位以后，所以该奖项对我个人实际上未起任何“作用”。

在我正拟大展宏图大干一场时，“文革”的腥风血雨骤然而至，我仅仅由于“海外关系”和若干欲加之罪而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横遭一系列极其野蛮的迫害：抄家、扫地出门、批斗、关牛棚，以至家破人亡。善良而慈爱的老母含冤弃养，是我毕生最大的伤痛，永难平复。从牛棚里放出来后，也不许“乱说乱动”，更不用说搞科研了，只是后来又下达了国防科研任务，那帮不学无术的“造反派”实在干不出名堂来，才不得不勉强恢复了 my 科研权利。最后虽然“彻底平反”，但各方面的惨重损失又岂能挽回于万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以“劫后余生”决心奋力工作，希望尽可能抢回一些被耽误的宝贵时光。十多年内，我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3篇，其中不少理论性论文填补了学科空白，引起国外同行的高度重视。1985年9月，第三届国际低频噪声和振动会议在伦敦召开，本应由老所长汪德昭院士出席的，可他患了眼疾，临时决定让我代替；幸而当时我正好有一篇尚未发表的高质量切题论文，乃以最快速度译成英文发往会务组并得到认可。在大会上我的学

术报告获得好评，会后还应邀访问了剑桥大学等高校。这次难得的机遇首次向我敞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其后于1988年11月，国际知名的电离层专家、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物理系主任Whitehead教授联合墨尔本大学和拉筹伯两所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共同邀请我前往讲学。再后来，1990年春，在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最高等级的资助下，我应邀先后在分布于本州岛七八个城市的1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为时两个月整。在此之前的1989年我刚满60岁，尽管还有科研任务在身、所带研究生尚未毕业，所里还是让我退休，据告那年全部“一刀切”，真是什么都让我赶上了。

但我实际上是退而未休，除了义无反顾地按时完成上述各项未了事宜外，还陆续发表综述性论文多篇，出版科普读物《声学漫谈》（其中第八章为马大猷所写，1994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月由台湾牛顿出版公司出版）和专著《大气声学》（科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7年再版）。前者属于《科学家谈物理丛书》系列，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并被资深科学家们推荐列为100本最佳科普读物，最近湖南教育出版社又决定再版重印。后者为该领域全球迄今唯一专著，第一版属于《现代物理学丛书》、第二版属于《现代物理基础丛书》。先后有多家国际著名出版社考虑出英文版，学术价值得到肯定，但均因对市场价值的顾虑半途而废，现所里决定“自力”出版，科学出版社等公司都表现出强烈兴趣。此外，1991年我赴美探亲时，应邀在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物理声学”

方面全美排名第一的密西西比大学物理系讲学。其中关于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悲剧性爆炸所产生次声波的检测结果（为全球仅有的珍贵资料）特别引起听众兴趣。另一次是2000年，《声学漫谈》台湾版的策划人、台湾大学理论物理中心陈义裕教授邀请我赴台讲学，除台大外，新竹清华、东吴大学、“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央大学等单位在见到海报后都纷纷提出邀请，我也依次在各处作了讲演。这也充分体现出台湾学界对大陆学界的关注，令我为能在退休10年后对两岸学术交流略尽绵力而深感欣慰。

2006年，经过慎密考虑，素以要求严格著称的导师马大猷院士正式提名我为“何梁何利奖”候选人，虽后来以提出太晚、政策有变而未能入选，但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的成绩。就在本文脱稿之际，马大猷院士在长期卧病后于2012年7月17日晨以97岁高龄去世，从而本文可视为对这位大师的一种纪念。

我班在今年4月29日校庆日时举行毕业60周年聚会，那天实际到会同学17人，其中3位是从外地赶来的。开会前依照我的动议为去世同学默哀三分钟。据回忆，我班于1948年入学时大约是50位同学，主要是当年考入的，另外有少数是从先修班上来的或者上一班留下来的，以及后来插班进来的。1950年，有相当数量同学转到工学院各系，毕业时共38位同学，迄今已有8位作古。同学们相聚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无所不谈；但比谈话内容更重要的是相聚本身！

在此耄耋之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真是感慨万分，太多的往事实在不堪回首！60年来的变迁让我懂得：世道远非我毕业之初所设想的那么单纯、公正，人生道路也绝不是那么平坦、顺畅；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对任何困难都不能低头；在逆境中更要竭尽全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作出些贡献，而不致完全虚度此生。

深感清华雨露情

○曾俊伟（1952经济）

岁月易逝，时节如流。我从清华毕业到现在，倏忽将到60周年了，60年恰是一个甲子。在历史长河中甲子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占了大部或整个时间。在此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愿意将自己六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感受诉诸笔端，谨请学长与后来的清华学人指正和鉴戒。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反思，但愿能起到“温

故知新”的作用。

魂牵梦萦清华园 终于实现夙愿

我高中是在抗战时的国立二中上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扬州中学，抗日战争时学校迁到我的家乡四川省合川县。当时的扬州中学，是全国名校，所以我们本地人要考进去很不容易。二中的特点是：老师